学术专论

文字改革与中国近代速记术的确立

林　翔

[摘要]　中国近代速记术的雏形是一种文字改革方案。它仿照西方的速记样式，融合汉语音韵创造而成，最初主要传播于民间。预备立宪时，清政府意识到速记术的重要性，拟聘请熊崎健一郎来华教授《支那速记术》，却遭到拒绝。其时，蔡锡勇的《传音快字》受到清政府的发掘和重视，被改造成更具中国语言特色的速记术，此即速记学堂的教学蓝本。这标志着“速记术”正式由传授于民的文字改革方案转变成一项服务于民的专业技能。“速记术”性质的转变也体现出清末拼音化文字改革式微，中国的文字改革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关键词]　文字改革　速记术《传音快字》　《支那速记术》　速记学堂

[中图分类号]　K25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4）－01－0114－012

速记术是一门用简便的符号系统快速记录语言的实用技术，它在近代议会制国家的国会记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速记术整理而成的“国会会议速记录”，被誉为研究近代议会最原始、最权威的资料，集中反映了宪政运动的成败得失。① 速记术的重要性可见一斑。然而吊诡的是，中国近代速记术的雏形是一种文字改革方案，速记术的确立过程一波三折。清政府曾试图聘请日本学者熊崎健一郎担任资政院速记学堂的教习，教授《支那速记术》（熊崎为中国编写的速记术），熊崎氏没有就聘。其时，原本作为中国文字改革方案的《传音快字》，受到清政府的重视，该方案最终发展成速记学堂的教学蓝本。

为何中国学人会将速记作为文字改革方案提出？为何在熊崎氏拒绝中国的聘请之后，《传音快字》才引起清政府的关注，并最终获得官方资源的青睐？长期以来，关于中国速记史的研究，均将《传音快字》视作中国近代速记术之滥觞；很多关于中国“国语运动”的著述，亦将速记

[收稿日期]　2022－12－01
[作者简介]　林翔（1991—　），女，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北京 100081，linx0310@126.com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和制汉语’与日本近代概念史研究”（23CSS025）阶段性成果。

① 目前不少“国会会议速记录”已汇编出版，如李启成点校：《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晚清预备国会论辩实录》，上海三联书店，2011 年；《帝国議会議事速記録 貴族院・衆議院》（第 1–52 回），高橋写真，1978 年；Thomas Carson Hansard, and Great Britain Parliament, eds. *The parliamentary debates from the year 1803 to the present time: forming a continuation of the work entitled“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the year 1803”*. London: Printed for Longman, 1803–1908. 又如数据库《美国国会记录专辑》（Congressional Record Permanent Digital Collection，简称 CRPDC），收录了美国近现代国会会议录。

式方案囊括其中。[①] 不过，仍鲜有学者就中国近代速记术的形成过程展开讨论。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近代速记术的确立，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日本的影响，相关研究亦不甚充分。日本速记学者兼子次生在《中国的速记》一文中，概述了清政府聘请熊崎健一郎的过程。[②] 该文应主要基于《支那速记术》中的《自述》，与其他中、日文史料的结合考证则略显不足。《支那速记术》被收录于1914年出版的《新式速记术独修》的附录部分。据笔者所见，目前除日本速记协会外，各综合图书馆皆无该著作的藏本。笔者在访学日本期间淘得此书。引人注目的是，当时的日本政要大隈重信、大岛久直、小松原英太郎、花井卓藏、福岛安正分别为《新式速记术独修》作序，对《支那速记术》予以高度评价，日本政界对《支那速记术》的重视程度显而易见，而这一问题尚未引起关注。

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文化史的视角切入，通过利用与解读中、日史料，系统考察中国近代速记术的确立过程，梳理文字改革与速记术之纠葛，由此管窥中国政治与文化近代化的早期历程。

一、作为文字改革方案的“速记术”

中国近代的速记术发端于切音字运动。所谓的切音字运动，是指清末在中国民间兴起的拼音文字运动。该运动旨在创造并推行简易的拼音文字，以辅助汉字，达到普及教育和启迪民智的作用。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民族危机加剧，学习西方代表了时代前进的方向。19世纪90年代前后，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意识到唤醒民众对于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性，他们将目光转向社会下层，认为文字关乎国民素质和国家兴衰，主张改革中国的文字。受西方“表音文字”的影响，中国人传统观念中的汉字的神圣地位受到威胁，“文字工具论”广泛流行。1892年，卢戆章创制“中国第一快切音字”，正式拉开了切音字运动的序幕，中国近代的文字改革亦由此发端。[③]

1898年之前，中国切音字方案的字母形体以速记符号为主，1896年至1897年共有四种速记式方案。可以说在19世纪90年代，速记式方案曾盛极一时。[④] 其中，《传音快字》被誉为速记式方案的元祖，也是最具代表性的速记式方案。

《传音快字》的作者是蔡锡勇（1847—1897）。蔡氏早年入学广东同文馆，主修英文；后来因京师同文馆扩充规模，被保送入京深造。在京师大学堂求学期间，蔡锡勇在李善兰、丁韪良等中外名师的指导下，接受近代教育的洗礼，成为中国较早的一批自主培育的现代化人才。[⑤]1875年，陈兰彬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奏调蔡锡勇为翻译官。[⑥] 蔡锡勇驻华盛顿四年，他在此时开始研究速记文字，历经十余年，于1896年出版《传音快字》。

蔡锡勇同其他切音字创造者一样，认为中国文字繁难，不利于普及教育。在他看来，中国

---

① 关于速记史的研究如唐亚伟等主编：《中国速记百年史》，学苑出版社，2000年。关于“国语运动”的研究如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1934年；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切音字运动）编年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等等。

② 兼子次生：《中国の速記——百花斎放の歴史》，《アジア経済旬報》1984年10月下旬号。

③ 中国近代文字改革肇始于切音字运动，清末的文字改革以该运动贯穿始终。虽然现在学界普遍将切音字看作汉语拼音之滥觞，但是当时多数切音字运动者意在推行一种简易的“文字”，以与汉字分工并用。

④ 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切音字运动）编年史》，第38页。

⑤ 苏精：《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福建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195页。

⑥ 需要指出的是，蔡锡勇曾在《传音快字》的自序中写道：“余昔随陈荔秋副宪出使美、日、秘三国。”因此，目前学界普遍认为蔡锡勇曾随兰彬秋出使美国、日本和秘鲁。其实蔡锡勇文中的“日”是指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笔者认为，蔡锡勇创制“传音快字”时并未直接受到日本的影响。

文字的繁难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汉字数量庞大，短时间内难以掌握很多汉字。另一方面，中国文字和语言不一致，汉字不利于记诵。与此相对，蔡氏认为美国速记文字简单易学，指出，泰西各国承用罗马字母，虽然音读不同，但是都以切音为主，“寻常语言，加以配合贯串之法，即为文字”，泰西因为切音文字，“自上至下，由男及女，无事不有学，无人不有学”。蔡锡勇注意到美国的“快字”（即速记文字）。据他回忆，他在驻美国期间除了从事翻译工作，闲暇之余便考察美国的政教风俗。他发现美国的议政会议虽然“反复辩论，杂还纷纭”，散会后众论繁杂，但是会议内容却能够被准确地记录并传播。蔡锡勇认为这是快字的功劳：美国的快字行之已久，虽然作者不一，且师承各异，但是皆能“笔随口述，不假思索，手不停挥”，大概每分钟能记录二百字之多。他感慨泰西的文字原本就简便，这种速记文字更是“简而又简”，如果使用快字，则“一人可兼数人之力，一日可并数日之功”。①

《传音快字》在美国人凌士礼一派速记术的基础上改写而成，拼写的是北京官话音。正如蔡锡勇所说，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速记术作者不一，师承各异。尤其是，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速记术发展迅速，进入社会的各个领域。此时速记术在西方世界已形成了三大体系：正圆系（又称几何系）、椭圆系（又称流线系）及斜体系（又称草书系）。②1837年，英国人伊萨克·皮特曼发表《速记的记音法》，创成正圆式速记。该方案于1840年被皮特曼的弟弟带到美国。虽然19世纪80年代，就职于律师事务所的速记员约翰·葛锐格创立了椭圆式速记，但是，此时正圆系速记依然在美国占据主流地位。③因此，蔡锡勇的《传音快字》也主要受到正圆系速记的影响（凌士礼的速记术便是典型的正圆系）。

具体而言，“传音快字”分为二十四声（即声母）和三十二韵（即韵母），共计56个符号，声母用横、直、斜、正、轻（细）、重（粗）的直线，韵母用小弧、小点、小画；采用双拼制，即“一声一韵，两笔相连，切成一音”。在声调方面，为了使平仄不至于混淆，《传音快字》的标调方法是“用直行格纸，顺格线书之”：“偏左而近者为平声，偏左略远者为上声，偏右而近者为去声，偏右略远者为入声；上平则声与韵连笔，下平则声与韵分笔。”蔡锡勇指出，待到习熟之后，便可以自然而然地辨别平仄，审音及表注读音都可以不假思索地信手书之。④

与《传音快字》同时期的速记符号式方案还有沈学的《盛世元音》、力捷三的《闽腔快字》，以及王炳耀的《拼音字谱》。这些方案具有一定的共同特征或相似之处。

首先，这些切音字的编写目的显而易见，都是为了适应新事物频出的时代环境。切音字创造者要求变通文字，提高识字率，以谋求富强之道。沈学认为，当时议事者，莫不以变通文字为怀，如官方、兵法、农政、商务等，而他“以变通文字为最先”：变通文字，则“学校易广，人才崛起”。⑤王炳耀也指出，如果在文字之外复加拼音文字，拼切方言，使男女易于学习，这实乃“立强国无形之实基”。⑥

其次，这些切音字方案的作者多曾沐浴欧风美雨，与传教士联系较为密切。沈学是上海梵皇渡圣约翰书院（圣约翰大学的前身）的医科学生。圣约翰书院即由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创办，是中国第一所全英语授课的学校。沈学精通英文，《盛世元音》原名 *Universal System*，用英文写成，后来节译成中文，刊登于《申报》和《时务报》。《拼音字谱》的作者王炳耀是传

---

① 蔡锡勇：《传音快字·自序》，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第1–4页。

② 总体而言，世界各国的速记术可分为此三大体系。关于这三种体系之异同，可参考赵邦典、王宏福编著：《大众速记》，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

③ 关于世界各国速记术的产生与发展，可详参饶素华、刘嘉俊编著：《汉语手写速记在语言文字中的理论与实践》，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第7–9页。

④ 蔡锡勇：《传音快字·凡例》，第8–11页。

⑤ 沈学：《附盛世元音原序》，《盛世元音》，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第4、6页。

⑥ 王炳耀：《拼音字谱·自序》，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第11–12页。

教士，其父王元深是礼贤会的著名牧师。王炳耀师承于传教士叶纳清、吕威廉，终身从事传教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除沈学之外，这些速记符号式方案的创造者都出生于福建、广东地区：王炳耀是广东人，力捷三和蔡锡勇都是福建人。中国“首创音字之元祖”卢戆章也是福建人。可见中国切音字运动发端于福建、广东一带，首先在这一区域形成一定的规模，这与早期传教士的传教及其创制注音拼音活动密不可分。

再次，这些速记符号式方案的字母形体及拼写方式较为相近。《闽腔快字》其实是《传音快字》的“闽音谱”，即对“传音快字”的声韵加以增删，用以拼写福建方言。力捷三在《闽腔快字》的《凡例》中阐释道：传音快字创自泰西，阅时已久，精益求精，简益求简，蔡锡勇深究各家成法，认为凌士礼氏的方式最为简便，“因取其法，演作正音，参其己意，变通增减，洵堪传世”，但是福建土音与正音不同，如果不另做闽腔快字，则虽有正音快字，还是无法供福建人使用。因此，力捷三在蔡锡勇的方案的基础上融会闽腔字音，另外制成“榕腔快字”。[①] 王炳耀的《拼音字谱》也与《传音快字》相近。倪海曙指出，《拼音字谱》“以一画开天为音母，或竖之、横之、斜之、折之，或拼合变化之，成韵母字；运一成象为太极，或直判、横判、十字判，因体变化之，为快笔声母字。合声母、韵母作体成字”。这仍旧脱离不了速记符号的样式。[②]

最后，速记式方案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现代语法的发展。众所周知，《马氏文通》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现代语法学的开启。诚如梁启超指出，《马氏文通》是把王引之、俞樾之学融会贯通之后，仿欧人的文法书，把语词详密分类组织而成的，“中国之有文典，自马氏始”。[③]《马氏文通》出版于1898年，在此之前的切音字速记式方案中已经萌生了现代的词类观念，并且出现了相关术语。《传音快字》最早使用术语“连书”，书中列举了“那个”“果然”“差不多”等例词。倪海曙指出，由于接触外文的关系，蔡锡勇已经有了“词”的观念，但是中国那时还没有语法书，问题说不清楚，所以蔡氏没有另定条例，只能说：“若夫触类引申，一笔连书，可代数字，则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矣。”[④] 沈学则仿照泰西，对汉字“字义”进行分类。[⑤] 他其实区分的是汉语的“词类”。王炳耀也分别按照词义和词性进行分类：基于词义，分为天类、飞类、地类等；基于词性，分为名目字、实字、形容字等。[⑥]

速记式方案虽然在中国近代语言文字改革中贡献颇多，但是无法成为日常使用的文字。1900年，维新志士王照的切音字专著《官话合声字母》付梓。此方案以汉字笔画式为字母形体，是切音字运动后期的主流方案。[⑦] 王照指出：“就福建蔡氏所作速记之字而言，于拼话实未适用也。”[⑧]1908年，一篇题为《行用简字平议》的文章也分析道：切音字母的形体虽然不宜过繁，但也决不宜过简，西洋的速记符号“系专门之学，非普通所应用”，普通应用的字母决不可采用速记符号，蔡锡勇的快字之类，只能用于速记。[⑨] 正因如此，20世纪以降，切音字运动鲜有速记式

---

① 力捷三：《闽腔快字・凡例》，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第13–14页。

② 倪海曙：《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1–42页。

③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全集》第12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99页；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启超全集》第3集，第95页。

④ 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切音字运动）编年史》，第37–38页。

⑤ 沈学：《盛世元音》，第14页。

⑥ 王炳耀：《拼音字谱》，第76、79页。

⑦ 20世纪以降，最具代表性的切音字方案是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和劳乃宣的《简字谱录》，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增补方言的声、韵母而制成的用于拼写方言的“简字”，所以二者基本上可以看作同一种方案。

⑧ 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原序》，《小航文存》，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7辑，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81–82页。

⑨《行用简字平议》，《通学报》1908年第6卷第3期。

方案，在资政院速记学堂设立之后，速记逐步发展成一种专业技能。

二、预备立宪与资政院速记要求的提出

中国近代速记术确立的直接原因是清末预备立宪。1905 年，日俄战争以“蕞尔小国”日本大败老牌欧洲强国俄国告终，予世界各国以强烈之震撼。经过反思，中国人将该战争归结为“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认为战争的结果是立宪对专制的胜利。① 清政府为挽救危局，被迫接受改良派的“立宪”建议，宣称“预备立宪”。1908 年，资政院总裁溥伦、孙家鼐会同军机大臣奏定《资政院院章》，复于次年改订《院章》，规定：资政院秘书厅分为机要科、议事科、速记科和庶务科；秘书厅应设书记及速记生等员额由秘书长酌量，事务繁简，秉承总裁、副总裁酌定。②

由于中国没有速记术，溥伦和孙家鼐在 1908 年便意识到，国会开设以后，如果没有速记人员，必将影响议事，故拟选派具有速记资格的人员赴日、英、德三国专修速记术，以两年为毕业期限，学成回国后首先在资政院记录会议事项。他们特别指出，速记人员在资政院的工作只是见习，派员学习速记的最终目的是日后在国会开设之时记录政府和议院的演说。③1909 年，预备立宪在即，亟需速记专员，资政院又致电驻日钦使，要求调查在日本学习速记学科的学生，咨报其姓名，以便派充资政院速记科；同时还要求在日本采购“自习速记书”，寄送到资政院，以便资政院内有关人员学习。④ 可以看出，清政府十分关注日本的速记术。更为典型的是，清政府曾聘请日本速记学家熊崎健一郎来华担任速记教授。

熊崎健一郎（1881—1961）是日本著名的速记学者，熊崎式速记法的创造者。⑤ 他自 1898 年起接触速记术，先后任职于日本中京新报社、三重成功新闻、伊势新闻社。1903 年，受原敬的聘任，入大阪新报社，从事速记事务相关工作，又于次年辞职入京，效力于时事新报社。熊崎曾参加众议院的速记者选拔考试，在 34 名应试者中位列榜首。后来放弃了就职于众议院的机会，于 1906 年出版《新式简明速记学教授书》，于次年将该书加以完善，出版《最新速记术》。《最新速记术》的问世标志着熊崎式速记法的确立。

值得注意的是，熊崎健一郎于 1903 年前后开始编写《支那速记术》，该方案于 1908 年成稿。1914 年，熊崎健一郎的《新式速记术独修》由博文馆出版发行，《支那速记术》被完整地收录于该著作的附录部分。

熊崎健一郎在《新式速记术独修》中阐述了“支那速记术”的发明缘由。他首先就中国的国内时局，指出中国是东半球上拥有四亿黎民的大国，古往今来以悠悠四千年的历史为骄傲，却向来没有速记术；《新式速记术独修》付梓时，中国既已树立共和政体，实行宪政，使用速记术是必要切实之举。然后，熊崎氏分析道：“从时运的大势观之，方块字的非文明性日益凸显，亟需应用快捷的速记术……支那的语言本就颇为复杂，其文字笔画繁琐，字数饶多，大致有数万字，将这些文字一律网罗在内，转换成速记简明文字，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熊崎健一郎认为：“正因如此，支那人自不待言，世界速记学者之中对支那速记术的研究也尚无端绪；尤其是，欧美人认为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应该作为规范世界语言的准则，坚信他们的语言最为高等，

① 《立宪纪闻中国立宪之起原》,《东方杂志》1906 年第 3 卷临时增刊。

② 《资政院改订暨续订院章》,《北洋官报》1909 年第 2179 期。

③ 《会议派生出洋学习速记法》,《申报》1908 年 5 月 17 日，第 4 版。

④ 《速记需人》,《四川官报》1909 年第 26 期。

⑤ 日本的速记术派系驳杂，分为复画派、折衷派、单画派等，具体方式又可分为田锁式、熊崎式、中根式等。关于日本速记术的派系可参见武部良明:《日本速記方式発達史》，日本書房，1942 年。

而东洋语言在语学方面的发达程度最为落后。他们将支那语视为芜杂晦涩的语言、无法论及的‘难语’，确信支那语无法具备在一定的法则下转换成速记的性质，因此从未涉猎支那速记术。”有鉴于此，熊崎健一郎以发明“支那速记术”为己任，致力于在改良日本速记术的同时研究中国速记术。①

就《支那速记术》的内容而言，熊崎健一郎从速记学的角度把汉语读音归纳为 399 个音素，并将这些音素与速记符号一一对应。速记符号则参照他的“熊崎式日本速记术”，以一个圆形为基础，对其做几何式分解，再以分解成的 22 个线性的符号为原型，进行排列组合，制成所有速记文字。②

虽然熊崎健一郎写道，此时还没有可供参考的关于中国速记研究的著书，他几乎绝望，在“千挫不屈”的精神的鼓舞下才创成“支那速记术”，但是，其实当时的日本速记界不乏关于其他国家速记术的研究。早在 1897 年，日本《朝日新闻》的一篇报道指出，田锁纲纪在日本速记术的基础上发明了“欧语速记术”，并拟创汉语和朝鲜语速记术。③ 田锁纲纪对汉语等外语速记术的兴趣应是基于速记者研究领域的扩展，而从熊崎健一郎的表述看，熊崎氏创造速记术主要是为了促进中国的文明进步。因此，他在编成速记术后便将此方案递呈日本陆军中将福岛安正男爵，希望通过福岛，将他的成果传至中国。

福岛安正对熊崎氏的“支那速记术”赞不绝口，他向中国驻日公使胡惟德引荐熊崎健一郎。据熊崎健一郎回忆，胡惟德曾任驻俄公使，对欧洲速记术有所了解。熊崎健一郎在福岛安正的引荐下拜访胡惟德，并向其展示他的速记方案，胡惟德看到这一发明后惊喜不已，对熊崎健一郎致以感激之情。两周之后，熊崎健一郎再次拜访胡惟德，胡惟德赠予熊崎氏两首绝句：

（其一）开天一画溯义皇，文体繁苛字体庞。
通俗便民谋善术，即今万国竞梯航。
（其二）执简删繁义例新，三年刻楮讵辞辛。
灌输别有深心在，不仅东游作导人。
熊崎健一郎君以所著中国速记术见示，翻阅一过，殊佩精简，因题绝句二章，归之，以志欣慕。
大清光绪三十四年九秋之月　　胡惟德 识④

其大意为：伏羲画八卦，首为乾卦第一画，自此文体繁多，字体庞杂，当下世界各国正竞相谋求通俗便民之技术，寻求有效之途径；熊崎速记术删繁就简，主旨、体例新颖，是其历尽千辛、精雕细琢之作，熊崎氏传授速记术有着深刻的用意，不限于为日本作引导。胡惟德对熊崎速记术的赞赏显而易见。

同年，胡惟德将《支那速记术》原稿转呈清政府。时任《资政院院章》编纂主任、民政部左参议的汪荣宝对熊崎速记法做了为期数月的精细调查；资政院总裁溥伦在看到熊崎速记术后，也予以高度评价，称此方案较为精巧。1909 年，资政院托日本驻中国公使馆武官陆军少将青木宣纯聘请熊崎健一郎，青木宣纯致电福岛安正，写道：“中国政府欲聘请支那速记术发明者熊崎健一郎氏，既已承诺待遇等其他条件，请予以取调，望回电为盼。”⑤

福岛安正从中积极运作，他劝熊崎健一郎接受清政府的聘请，指出这不仅能够完善中国的

---

① 熊崎健一郎：《新式速技术独修》，博文館，1914 年，第 521–522 页。
② 熊崎健一郎：《新式速技术独修》，第 534 页。
③《外国速技术の講演》，《朝日新聞》1897 年 3 月 16 日，第 2 版。田锁纲纪（1854—1938），日本速记学者，日本速记术的创始人，被伊藤博文誉为“电笔将军”。
④ 熊崎健一郎：《新式速技术独修》，第 522–523 页。
⑤ 熊崎健一郎：《新式速技术独修》，第 524–525 页。

速记术，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作为中国“人文开发”的组成部分，借此弘扬日本帝国的名誉；就待遇而言，由于目前在世界各国之中，熊崎氏的“支那速记术”无可替代，中国必定会答应日方的任何要求，立刻就聘实为上策。①

然而，熊崎健一郎此时效力于日本时事新报社，得知聘请消息的前几日刚被该报社“委以重任”。于是熊崎氏以“一片之道义比一身之名利更为重要”为由，拒绝了清政府的聘请。他托福岛安正代为转达拒聘之意，福岛安正顺势向清廷建议：“熊崎既已不能就聘，不如以聘用熊崎的费用，派遣留学生数名，努力使其学成（支那速记术）。”②

值得注意的是，熊崎氏的《支那速记术》其实还受到了很多日本政要的关注。是年即将再度组阁的大隈重信在《新式速记术独修》序言中指出：“支那的语言复杂繁琐，不成系统，编成表达支那语言的统一之术式是何等困难之事，这可想而知”，然而“未料到的是，日本知名速记学者熊崎健一郎编成了前所未有的支那速记术，完成了至难的绩业，此乃日本帝国的荣誉！”③日本陆军大将大岛久直也指出：“支那速记术的发明是值得在世界速记史上大书特书的事迹，熊崎氏完成了国内外学者未曾涉猎的至难至艰的事业，其功劳永远不可磨灭。”④日本贵族院议员、前文部大臣小松原英太郎同样认为：熊崎氏发明“支那速记术”，被中国政府采用，实属日本速记界之荣誉。⑤

福岛安正为《新式速记术独修》所作的序言则直接以“支那速记术之魁”为题，写道：“中国既没有速记术，也没有其他快速书写的技术，其上下三千年的文化均由方块字支配，如今熊崎氏创成了富于文明的线性速记文字，这对中国而言是极其值得庆贺之举……该速记术组织结构统一，法则完美，使我由衷地惊叹不已。”福岛安正强调：虽然熊崎氏拒绝了清政府的聘请，但是其著作仍由清政府保管，这将永远作为“支那速记术”发达的基础；不仅如此，熊崎氏创成此方案的功绩实为世界速记史上具有浓墨重彩的一笔。⑥

虽然福岛安正的评论有夸大的成分，但是熊崎速记术的确促进了中国速记的发展。一方面，如福岛所言，《支那速记术》传入中国，成为中国速记研究的基础材料。另一方面，资政院速记学堂教习蔡璋曾游学日本，蔡璋的速记术研究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田锁纲纪和熊崎健一郎的方案。速记学堂的成立也标志着对中国而言，速记术转变成了一项专业技能。

三、从“传授于民”到“服务于民”：“速记术”的功能转变

如前所述，速记学堂的成立源于预备立宪的需要。1910 年 2 月 4 日，资政院奏《筹设速记学堂拟定章程折》并得旨俞允。速记学堂顾名思义，以教授速记法为主，旨在培育速记人才，以备资政院及各地方议会速记之用。其教学科目为四门：速记术、国文、官话和法政大意。⑦汉语汉文是基础课程，“法政大意”科目的设立则体现出速记学堂服务资政院及各级议会的性质。

关于速记教材的选定和教员的聘请，蔡锡勇之子、译学馆学生蔡玮曾于 1907 年向清廷进呈《传音快字》。清政府认为此方案“颇为简易，便于多数下等之人，惟与教科无甚相涉”。⑧《传音快字》故而未能通过审批。可见一方面，创制简易的、便于普通民众识记的文字既是蔡锡勇

① 熊崎健一郎：《新式速技术独修》，第 525 页。

② 熊崎健一郎：《新式速技术独修》，第 526 页。

③ 大隈重信：《序》，熊崎健一郎：《新式速技术独修》，第 1–2 页。

④ 大島久直：《序》，熊崎健一郎：《新式速技术独修》，第 5 页。

⑤ 小松原英太郎：《序》，熊崎健一郎：《新式速技术独修》，第 7 页。

⑥ 福島安正：《支那速技术の魁》，熊崎健一郎：《新式速技术独修》，第 10–12 页。

⑦ 《资政院奏筹设速记学堂拟定章程折》，《政治官报》1910 年第 827 号。

⑧ 《审定书目：译学馆学生蔡玮谨呈其先人所著〈传音快字〉一书请审定禀批》，《学部官报》1907 年第 11 期。

创制《传音快字》的初衷，也是清末切音字运动的初衷。清政府肯定了《传音快字》的简易性，便于粗浅之人习用，意味着速记仍然仅被视为切音字方案。另一方面，清政府认为《传音快字》与教科书无涉，不予批准，缘于此时关于速记术的需求还未被提出。从切音字的角度看，清政府也不提倡速记式切音字方案。

这也侧面反映出，《传音快字》等速记方案主要传播于民间。蔡锡勇在创成“传音快字”以后首先以此教授他的儿辈，据说他们在数日后就能通晓这种“文字”，用于传信往来，即使是其八岁的幼子也能“以言自达”。[①] 蔡氏随后将《传音快字》赠予《万国公报》的主笔蔡尔康。蔡尔康做《书〈传音快字〉后》一文，刊于《万国公报》。蔡尔康的推介，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传音快字》的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蔡锡勇是张之洞的幕僚，这一特殊身份也促进了《传音快字》的传播。他协助张之洞办理洋务，创设自强学堂，任总办一职。自强学堂是张之洞为培养“精晓洋文”的外交人员而创设的学堂，也是中国第一所自行创办和管理的新式高等专门学堂。蔡锡勇曾在自强学堂宣传《传音快字》。据音韵学家、速记学家汪怡回忆，他曾就读于自强学堂，在《传音快字》出版之际，蔡锡勇给每一位学生发放了一本。汪怡收到《传音快字》后，研究几天便明白了，但是依照他的个人用语，感觉音的方面有多有少，便大胆地增删了一下，又把直行改为横行，先教他的两个妹妹，不久便可以彼此通信。[②]《传音快字》的传播与受众的情况可见一斑。

不过，《传音快字》仍然没有受到清政府的重视。直至资政院及谘议局设立，清政府意识到速记术的重要性，《传音快字》才被重新发掘。经改造，其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速记学堂创办员汪荣宝有意聘请蔡玮担任速记学堂教习。他于 1909 年 12 月 30 日拟写聘请电稿，于翌年 2 月 4 日，与李家驹商定采用《传音快字》作为速记教本，延聘蔡玮为教习。2 月 9 日，蔡玮复电，称“因病未痊，荐其兄璋（蔡璋），娴熟快字，代理两月，再行接任”。[③] 汪荣宝接受蔡玮的建议，电召蔡璋从湖北进京，教授速记术。蔡璋（1872—1958）是蔡锡勇的第六子。他曾受张之洞的派遣，游学日本，考察政治。蔡璋在日本得以读到田锁纲纪和熊崎健一郎的速记术，于是他借鉴日本速记法，将《传音快字》“略有删改，又增添符号与连书法等编”。此即蔡璋用于速记学堂的教学蓝本。[④]

1910 年 3 月 29 日，汪荣宝与资政院秘书厅机要科科长范熙壬商拟《进呈〈传音快字〉片稿》。此稿于 4 月 3 日奏呈并获批准。该奏折写道：

> 速记学堂教授科目以速记法为最要。前经访闻，日本速记学者熊崎健一郎曾著有《中国速记术》，求得其书阅之，系就日本速记文字斟酌变通，以为传习中国语言之用。惟中国尚无娴习其书者，教授之人一时颇难其选。嗣查原任湖北汉黄德道蔡锡勇，前经随使美国，于速记之学夙有研求，所著《传音快字》一书，取曲直斜正粗细各线为纪音代字之符，其法等于美国人凌士礼，而参以己意，变化增损，以适于用。比诸熊崎氏书，形式虽互有不同，而义例实大略相近。该员以之传授乡里，通晓其法者，颇不乏人。记录甚捷，一时称便，以充臣院速记教科之用，似尚合宜。[⑤]

一方面，汪荣宝等人认识到，熊崎健一郎的“支那速记术”是在其记录日语的速记术的基础上改良而成的，该速记术得到汪荣宝等人的认可。速记学堂用《传音快字》取代熊崎氏方案，直

---

① 蔡锡勇：《传音快字·自序》，第 5 页。

② 汪怡：《几段有关国语速记的浅说》，《国语周刊》1934 年第 180 期。

③ 汪荣宝：《汪荣宝日记》，凤凰出版社，2014 年，第 71、81、83 页。

④ 蔡璋：《绪言》，蔡锡勇、蔡璋：《中国速记学》，中华书局，1934 年，第 12 页。

⑤《又奏呈进蔡锡勇所著〈传音快字〉书片》，《北洋官报》1910 年第 2397 册。

接原因是中国没有娴习与教授“支那速记术”之人。但是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二者虽然形式不同，但是主旨与体例相似。可见在蔡璋等人的努力下，中国速记术的体例已经较为完备，且更具有中国语言文字的特色，更适用于中国，记录便捷，易于学习，通晓者已不乏其人。（二者字母之比较可详参表 1 和表 2）

表 1 《中国速记学》《传音快字》《支那速记术》对应字母切韵表举例

《中国速记学》	《传音快字》	《支那速记术》
刀	刀	刀 Tao
滔	桃	滔 T ‘ao
高	高	高 Kao
考	考	考 K ‘ao
包	包	包 Pao
抛	抛	抛 P ‘ao

资料来源：蔡锡勇、蔡璋：《中国速记学》，第 17 页；蔡锡勇：《传音快字》，第 17 页；熊崎健一郎：《新式速技术独修》，第 535–543 页。

表 2 《中国速记学》《支那速记术》字母连书举例

《中国速记学》	你的 虽然 何不 亦是 此刻
《支那速记术》	你的 政府 诸公 日前 整顿

资料来源：蔡锡勇、蔡璋：《中国速记学》，第 23–24 页；熊崎健一郎：《新式速技术独修》，第 544–545 页。

依照《速记学堂章程》，速记学堂正式聘请蔡璋和蔡常担任速记教员，并于 1910 年 4 月 4 日举行开学典礼。蔡璋在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陈述了速记术之大意及中国速记术（传音快字）的历史。①

速记学堂的问题及不足之处其实较为突出，这也与中国速记术起步较晚、发展之不充分相呼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速记学堂急于速成，学制过短，“急就成章，难言美备”，其速记录错误百出。1910 年秋，《申报》刊登的一则《资政院速记录之笑柄》记载道，资政院开院第二日讨论的议题为“广西谘议局因土膏展限全体辞职事件”，速记人员对于这一事件“讵无闻见”，将“土膏”记作“土司”，记录为“因程度不到，致全体辞职”。《申报》评论道，此速记录“实足令人喷饭，其余颠倒错乱，无一是处”。文章呼吁资政院加强对速记员的管理，进一步指出，此速记生等佩戴勋章，衣着华丽，一副庞然自满的神情，实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② 其二，毕业生的就业问题。1910 年 10 月 18 日，速记学堂第一班学生毕业。按照规划，此批毕业生除由资政院给予文凭以外，应依据章程，派回原省谘议局任用。资政院指出，据谘议局章程，虽然办事处设置书记长、书记等专员，但是尚无速记职务，因此应“即于办事处添设速记员，专司议场记录之事”。③ 此后速记学堂又有学生陆续毕业，但是就业情况却不容乐观。

① 汪荣宝：《汪荣宝日记》，第 105 页。
② 《资政院速记录之笑柄》，《申报》1910 年 10 月 13 日，第 4 版。
③ 《咨回速记学堂毕业生》，《北洋官报》1910 年第 2569 册。

尽管如此，速记术对于中国政治近代化及语言学近代转型的影响却不容小觑。民国初年，蔡璋的《中国速记学》出版发行。此著作以速记学堂教材《速记学教科书》为原型，即在《传音快字》的基础上，参考日本《最新速记术》等著作，加以变通，以适于用，增制符号及连书等编著而成。①《中国速记学》被誉为中国最早的速记学专书。如美国传教士丁义华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中国速记学》) 纪录神速，单简易识，而辅助国家前途者，亦已伟矣。"② 汪荣宝之父、中华民国政府高等顾问汪凤瀛亦对蔡璋的贡献予以高度评价："是时参议院及各省议会司速记之职者，皆出自京师速记学堂，即蔡璋所造就者也。"③

尤为瞩目的是，为奖励蔡璋的功绩，民国政府特授予其四等嘉禾章。《铨叙局呈大总统核议教育部请奖蔡璋勋章请鉴核令遵文》写道："速记学为中国向来所无，中国语言歧离，文字繁复，从事速记，窒碍殊多。蔡璋之父蔡锡勇，昔年著有《传音快字》一书，当时学者视之不足轻重，以为无裨实用，其效遂亦不彰。蔡璋继承其父之学，精心穷究，演绎变通，教授成业者，至二百余人之多，效力于今日议会。铨叙局指出：'蔡璋发明速记学，于学问事业，均有功绩，非寻常功绩可比拟。'"④

民国政府奖励发明速记学者的做法，也借鉴了日本经验。田锁纲纪曾被赐予蓝绶褒章，后来又获得终身年金补贴。铨叙局亦提出："日本奖励发明速记学者，除给予勋章外，当给年金一节。"虽然民国政府因"奖金尚无定法"，没有给予蔡璋年金补贴，但是纵观全球古今，由政府奖励速记人士的做法较为罕见。据弋义等考察，中外速记界有史以来受到政府奖励的只有三人，第一位是英国的皮特曼，他于 1903 年被授予"凯奈特勋爵"，第二和第三位即分别是田锁纲纪和蔡璋。⑤

就语言学而言，如前所述，速记式方案促进了中国现代语法的发展，出现了现代的词类观念。从切音字的角度看，蔡璋曾是"读音统一会"的会员，他在"读音统一会"召开期间提出方案《音标简字》。⑥ 蔡璋在《音标简字》的《凡例》中指出，此方案的声与韵，皆本于蔡锡勇的《传音快字》，融合蔡璋自己的想法，"变通增减，以适于用"；此项声韵曾通过速记术，推行到各省：起初，资政院创办速记学校，二十二省各派学生来京学习，之后又附设研究所，汇聚诸生讲论，他们也对这些声韵均无异议，"各省学生毕业后，回省传播，颇收一致风行之效"。值得注意的是，如蔡璋所说，"音标简字"的字形与其教授的速记术不同。而且，二者的性质也截然不同，《音标简字》是为了"表注读音"，其实质是"简字"（音标）。蔡璋指出："简字写法，力求美观，与日本字母迥不相同，且书写纯熟，稍带行草亦可易办。"此外，蔡璋还著有《简字合音字典》一卷，以用于同《音标简字》相互考证，期以"更易了然"。⑦ 但是，即使蔡璋极力融合速记法与简字的声韵拼音和构字原理，《音标简字》还是没有成为"注音符号"的最终方案，这也体现出速记术与音标方凿圆枘。

从蔡锡勇发明切音字方案《传音快字》，到《传音快字》作为记录议会的工具，才受到官方的重视，再到蔡璋改良速记术，创制"音标简字"，可见至民国初年，速记学者即便改良速记术，亦无意于以此作文字，而早年的速记方案（如《传音快字》《中国速记学》等）更不能成为文字。速记术被定性为一门实用技术，侧面反映出清末拼音化文字改革的衰落，也意味着中国

① 蔡璋：《绪言》，蔡锡勇、蔡璋：《中国速记学》，第 12 页；丁义华：《序》，蔡锡勇、蔡璋：《中国速记学》，第 1 页。

② 丁义华：《序》，蔡锡勇、蔡璋：《中国速记学》，第 2 页。

③ 汪凤瀛：《叙》，蔡锡勇、蔡璋：《中国速记学》，第 6 页。

④《铨叙局呈大总统核议教育部请奖蔡璋勋章请鉴核令遵文》，《政府公报》1913 年第 477 号。

⑤ 弋义、弋力：《中英文通用速记》，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年，第 26 页。

⑥ "读音统一会"是 1913 年由北京政府教育部组织召开的会议，会议目的是规范、统一国音。

⑦ 蔡璋：《〈音标简字〉凡例》，文字改革出版社编：《1913 年读音统一会资料汇编》，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 年，第 27–28 页。

的文字改革步入新的发展阶段。①

四、结 语

速记术是近代西方代议制国家记录国会会议的主要手段，而中国近代最初的速记则是一种文字改革方案。清末中国的文字改革以切音字运动贯穿始终，速记式方案是早期切音字运动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这些方案仿照西方的速记样式，融合汉语音韵创造而成。不过，速记文字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速记符号无法成为日常文字；速记术是快速记录语言的工具，与文字有本质区别。如周有光指出：清末的速记设计者大都对于速记作用的限制性以及文字和速记之间的必然区别不很了然，所以他们才强调利用这种简单的符号作为群众的拼音文字。② 王力也评论道："这些创造家的通病，是流于速记式。大家抱着一种幼稚的见解，以为汉字之难在繁，新字的笔画越简越好。殊不知汉字之难认难写，只在乎其结构之不合理；至于笔画之繁简，乃是很微末的问题，笔画太简了，写起来虽省时间，认起来却加倍困难。"③ 简言之，速记文字虽然容易书写，但是却不利于辨认。王力进一步指出：速记术的历史最悠久者莫若西洋各国，然而西洋从来没有人主张拿速记式来替代文字。中国现在速记家也不曾主张拿他们的速记式来替代汉字，因为凡是稍有语言学常识的人，都知道速记式与文字是截然不同的两样东西，分则两利，合则两伤。④

在清末急于提高国民识字率的时代背景下，又鉴于当时中国知识界对于文字的认知水平，蔡锡勇等学者将速记作为文字改革方案提出来，这种做法无可厚非。后世学者也普遍认为，速记的特点，就是快，就是简单，用速记符号拟定拼音方案的人，就是希望用这种又快又简单的办法让人民掌握文字。蔡锡勇等学者对中国文字改革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一方面，他们"创立了最早的汉字改革理论，给人们比较科学的文字观，让人们知道文字是一种工具，工具越便利越好，旧的工具不便利，就可以创造新的"。另一方面，他们分析了当时的世界形势，让大家知道中国在各方面都已经落后；他们根据历史，指出汉字本身就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汉字改革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⑤

然而，速记式方案无法成为切音字运动的主流，也难以获得官方资源。直至清末预备立宪时，为记录议会会议，日本及欧美国家的速记术才真正引起清政府的关注。在熊崎健一郎拒绝清廷的聘请后，《传音快字》得到发掘和重视。究其缘由，正如《呈进蔡锡勇所著〈传音快字〉书片》所说，中国没有娴习与教授熊崎氏"支那速记术"之人，更为重要的是，虽然由蔡璋改编的《传音快字》所载与"支那速记术"形式不同，但是二者的主旨和体例相似。换言之，这其实反映出中国的速记术之"义例"已经较为完善，且更具有中国语言文字的特色，更适合中国人学习。蔡璋对《传音快字》的改编及速记学堂的设立，意味着速记术由传授于民的"文字"转变成一项服务于民的专业技能。至读音统一会召开，于中国而言，没有人会质疑速记术的性质，即速记术只能是文字的一种辅助工具。速记符号性质的转变也体现出清末拼音化文字改革的衰落，中国的文字改革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

① 1909 年，陆费逵发表《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提出了采用简俗字的建议；至读音统一会召开，切音字的性质最终被限定为"注音符号"，其功能正式由"拼写白话"变成"表注读音"。详参拙文《从"简字"到"简体字"——清末民初文字改良策略的调整》，《中国语文》2020 年第 3 期。

② 周有光：《周有光文集》第 1 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年，第 40 页。

③ 王力：《汉字改革》，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71 页。

④ 王力：《汉字改革》，第 71–72 页。

⑤ 倪海曙：《倪海曙语文论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年，第 85–86 页。

References

Ni Haishu. *Ni Haishu yuwen lunji*（Essays on Chinese language of Ni Haishu）.Shanghai：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1991.

Ni Haishu. *Qingmo hanyupinyin yundong (qieyinzi yundong) biannianshi*（Chronicle of the Chinese Pinyin Movement（the Movement of Qieyin Characters）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hanghai：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1959.

Ni Haishu. *Zhongguo pinyin wenzi yundongshi*（The history of Chinese Pinyin Movement）.Zhengzhou：Henan renmin chubanshe，1991.

Su Jing. *Qingji tongwenguan ji qi shisheng*（The Qing Dynasty Tongwenguan and its teachers and students）.Fuzhou：Fujian jiaoyu chubanshe，2018.

Wang Yi."JI duan youguan Guoyu suji de qianshuo"（A few paragraphs on Chinese shorthand）.*Guoyu zhoukan*（Mandarin Weekly）180（1934）.

Wang li. *Hanzi gaige*（The reform of Chinese characters）.Taiyuan：Shanxi renmin chubanshe，2014.

Yi Yi, and Yi Li. *Zhong ying wen tongyong suji*（Chinese−English jeneral shorthand）. Changsha：Hunan kexuejishu chubanshe，2001.

Zhou Youguang. *Zhou Youguang wenji*（Collected works of Zhou Youguang）.Beijing：Zhongyang bianyi chubanshe，2013.

Reform of Writing System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ese Shorthand

LIN Xia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linx0310@126.com)

Abstract: The precursor to modern Chinese shorthand was a proposal for reform of the writing system that borrowed from Western shorthand styles while incorporating elements of the Chinese pronunciation. Initially, this shorthand circulated primarily among the general populace.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government recognized the importance of shorthand as they prepared for constitutional reforms. They attempted to engage Kenichiro Kumazaki to teach "China Shorthand," but their offer was declined. Concurrently, Cai Xiyong's *Chuanyin Kuaizi* gained the attention and favor of the Qing government. It was subsequently adapted to better suit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serving as the foundational model for shorthand education. This transition marked the formal shift of "shorthand" from a reform of writing system proposal disseminated to the public to a specialized skill serving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This transformation in "shorthand" also signified the decline of alphabetic writ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marking the onset of a new phase in the development of reform of Chinese writing system.

Keywords: reform of writing system, shorthand, *Chuanyin Kuaizi*, *China Sujishu*, shorthand school